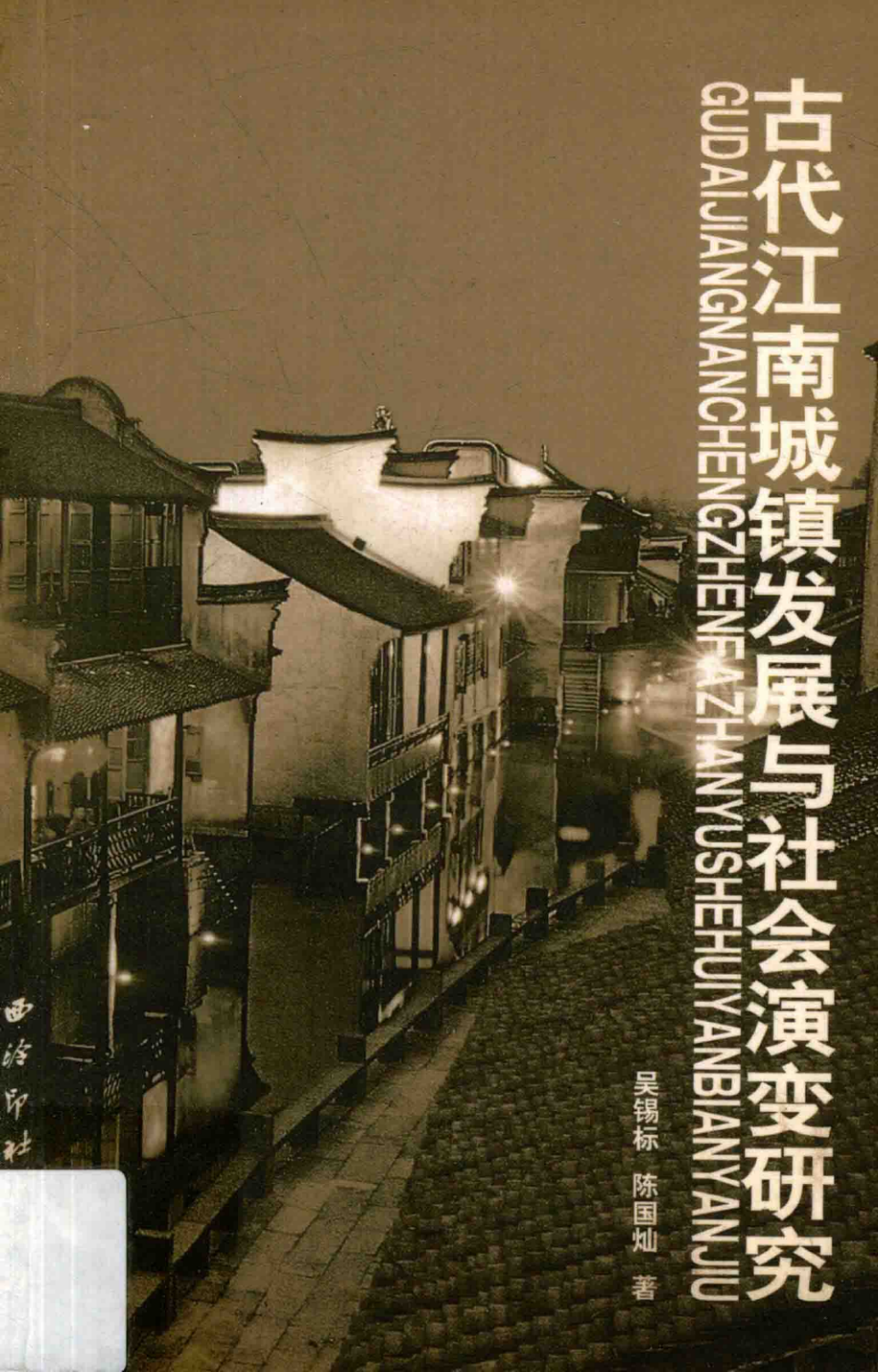




古代江南城镇发展与社会演变研究

GU DA I J I A N G N A N C H E N G Z H E N F A Z H A N Y U S H E H U I Y A N B I A N Y A N J I U

吴锡标 陈国灿 著

西
铃
印
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古代江南城镇发展与 社会演变研究

吴锡标 陈国灿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代江南城镇发展与社会演变研究 / 吴锡标, 陈国灿
著.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5.9

ISBN 7-80517-976-X

I. 古... II. ①吴... ②陈... III. 城镇—城市建设
—研究—华东地区—古代 IV. F29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0121 号

本书获衢州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古代江南城镇发展与社会演变研究

责任编辑: 姚建杭 许晓俊

特约编辑: 邱荣武 袁卫民

图文制作: 浙江中凯图书有限公司

出 版: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邮编: 3100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淳安千岛湖环球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45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2 000

书 号: ISBN 7-80517-976-X/F · 977

定 价: 38.00 元

序

两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应衢州学院的邀请，去该校作了一次学术讲演。虽说那是一所年轻、规模不大的学院，但那充满生机的发展势头、稚气犹存的学生以及浙西美丽悠静的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次访问中，我结识了该校科研处副处长吴锡标副教授，知道他长期从事区域社会史和中国书法史论等方面的研究，他本人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古代江南城镇发展与社会演变研究》(以下简称《江南城镇》)一书是他与另一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学者陈国灿教授合作完成的一项成果，是学界对中国古代城镇史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江南城镇》一书以江南地区为研究范围，以城镇发展与社会演变为研究重点，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系统地阐释了古代江南城市与市镇的发展历程及其反复与制约，探讨了江南城镇的经济与社会形态，是一部古代城镇史专著。在该著问世以前，学界已有不少有关江南地区城镇研究的专著，其中不乏学术精品，但这些专著多为断代的研究，或局限于对某个城市、某个地区的研究。《江南城镇》作者吸取了他们的成果，对整个古代(上溯秦汉，下至明清)江南城镇的历史加以梳理，向学界奉献他们对这部历史的新解释，以便学界讨论，促进学术繁荣。我以为，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二位学者的研究已为学界所关注，《光明日报》(2005年8

月23日“理论”版)“新论集萃”曾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新观点。相信《江南城镇》一书也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虽然城市史作者着眼于“史”的研究,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包括《江南城镇》一书在内的对中国古代城镇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正在以空前的速度与规模展开,世界性大都市将要出现,众多的新兴城市拔地而起,城市化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研究城市史成了学术领域的一个热点。一些学者对国外城市史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发展提供借鉴。10年前,我与我的几位学生撰写了《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其中就有“城市化”一章,探索美国城市化的道路,认为城市化—市郊化—现代城市代表了美国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在读了《江南城镇》一书后,我深深感到:除了借鉴外国之外,充分了解中国国情与城镇发展的传统是同样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任何发展与创新都离不开传统,或者说,都是基于传统之上的变革与飞跃。《江南城镇》一书介绍了众多城市与城镇,大至苏、杭、宁,小至市镇与集市,启示我们,历史留下的那么多城镇为当今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既广又厚的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巨大财富。中国的城市化可否在此基础上加以规划,在借鉴外国、发展少数大都会与超级城市的同时,对众多现在的城镇加以振兴与繁荣,藉此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对此,二位学者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吴锡标在《基于边缘化理论的思考》(详见《学术界》2005年第4期)一文中,结合历史、

现实以及人文环境等，对浙西南地区的城市化现状和发展道路进行了理性分析和思考。这样的研究是可取的，值得提倡。

18世纪末美国建国之初，“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佛逊鉴于欧洲城市发生的腐败与贫富分化，为使美国避免这些弊病，而主张在美国建立农业理想社会，“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只要仍然是农业的，在数百年内都会保持美德。……一旦他们像在欧洲一样互相拥挤在大城市里，那就会变得像欧洲政府一样腐败”。杰佛逊的主张虽然没有得以实行，但他所指出的城市弊病确是事实，而且几乎被世界上所有大城市的历史所证明。今天，再也不会有人提倡建立农业理想社会，但防止城市腐败与不公正仍是一个不可回避与需要设法解决的问题。我想，除建设少数的现代大城市外，更多地发展环境优美、有经济活力、有文化品位的中小型企业与市镇，会有助于克服腐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我看来，这样的中小型企业与市镇完全有可能率先出现和谐社会。《江南城镇》一书重视城镇的研究，把它与城市研究相提并论，以整编的篇幅详加论述，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尊重国情，实现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这是该书的现实意义所在。

我对古代城镇缺少研究，但读《江南城镇》一书颇有兴味，并且引发了以上这些想法。我作为该书的第一读者，书之以与学界同仁切磋交流，且以为序。

李庆餘

2005年8月于南京龙江寓所

绪 论

院書志立

目 录

绪论

中国古代城镇发展概述 (1)

第一编 古代江南城市史研究

第一章 江南城市的产生和发展

- 一 江南的地域范围 (17)
- 二 江南城市的起源与产生 (20)
- 三 秦汉时期郡县城市的确立 (26)
- 四 六朝时期城市的崛起 (31)
- 五 隋唐五代时期城市的持续发展 (37)

第二章 江南城市的繁荣和转型

- 一 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 (42)
- 二 北宋时期的初步兴盛 (50)
- 三 南宋时期的空前繁荣 (53)
- 四 城市类型的多样化和区域等级体系的形成 (59)

第三章 宋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形态

- 一 物资供应系统 (63)
- 二 居民收入与消费 (69)
- 三 工商业形态 (73)
- 四 市场结构与体系 (82)

第四章 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形态

- 一 居民社会结构 (87)
- 二 市民阶层的兴起 (94)
- 三 贫富分化与社会等级 (106)

第五章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发展与局限

- 一 社会演进的治乱交替 (111)
- 二 大城市的继续繁荣 (115)
- 三 中小城市的发展 (121)
- 四 城市发展的局限及其原因 (125)

第二编 古代江南市镇史研究

第六章 江南市镇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 一 宋以前的镇和草市 (133)
- 二 北宋时期的兴起 (138)
- 三 南宋时期的发展 (143)
- 四 元朝时期的调整 (152)
- 五 明清时期的空前兴盛 (156)

第七章 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市镇形态

- 一 市镇类型及其特点 (175)
- 二 商业和市场状况 (180)
- 三 手工业状况 (186)
- 四 人口数量与居民结构 (191)
- 五 街区结构与社会管理 (199)
- 六 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 (204)

第八章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

- 一 综合性街区的形成 (208)

- 二 居民结构的变化 (213)
- 三 市民阶层的形成 (219)
- 四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224)

第三编 古代江南城镇与社会发展研究

第九章 古代江南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 一 对“城市化”概念的简单讨论 (231)
- 二 以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 (237)
- 三 以市镇为核心的农村城市化 (241)
- 四 城市化的三种形态及其特点 (249)
- 五 影响城市化的几个因素 (252)

第十章 宋代两浙地区的市镇与农村经济

- 一 市镇网络与农村市场 (259)
- 二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272)
- 三 农村居民消费活动的市场化趋势 (280)

第十一章 宋代浙东南地区城市化现象分析

- 一 社会环境的变化 (289)
- 二 城市的兴盛及其影响 (294)
- 三 市镇的兴起和农村城市化现象的出现 (299)

第十二章 唐宋以来浙西南地区城镇化进程及其特点

- 一 自然条件与历史人文环境 (304)
- 二 唐宋时期的城镇发展形态 (309)
- 三 明清时期的城镇发展形态 (315)
- 四 地域特点分析 (323)

参考文献 (327)

后记 (341)

中国古代城镇发展概述

城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形态，它不仅仅只是地域性的概念，而是有着丰富内涵和典型意义的社会范畴，是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集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因素于一体的社会实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发展的状况更能深刻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社会发展的水平、特点和演变趋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城镇的国家之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城镇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从中表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明清以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城市发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无论在总体数量还是个体规模，抑或内在的发展形态上，都远非同时期其它国家或地区所能比拟。与此同时，城镇的兴盛和持续发展又反过来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实际环境的特殊性，各个地区城市发展的具体过程以及与社会的关系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归根到底是基于基本形态和特点一致性之上的同中之异。

综观中国古代城镇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秦代以前，为城市起源和产生阶段。

按照美国学者刘易斯·芒德福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的观点，城市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基于人类的群居天性而形成的聚住地。的确，中国城市的起源最早也可追溯到原始时代部落和氏族相对固定的村落或聚集地。这些村落和聚集地的出现，最初是由于早期人类所具有的与许多动物相似的生活倾向，即如同动

物构巢群居一样，人类也有群聚而居的本性。但随着人们定居生活的最终形成、劳动分工的逐步出现、社会阶层的缓慢分化、物质财富的相对集中，部分村落和聚集地便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某种原始城市形态的“城”或“城堡”，由此开始了古代城市形成的漫长过程。

根据考古成果和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我国历史上城堡的出现始于原始社会末期。《汉书·郊祀志》云：“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世本》引《吴越春秋》云：“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告廓以守民；”《博物志》更清楚地说：“处士东里槐责禹乱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廓盖自禹始也。”这些记载虽带有深厚的神话传说和主观想象色彩，但也并非完全属于空穴来风，其中当包含了一定的历史事实。由原始城堡进一步发展，便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邑”或“都邑”。《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尚书·召诰》引周公、召之语说：“今天其命哲，命吉凶，知今我初宅新邑”；《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周）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清代学者金鶚曾对邑作过一番详细的考证，指出：“邑者，民之所聚也。……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极其大而言之，则有王都之邑；极其小而言之，则有十室之邑。其间大小不等，未可枚举也。”^①可见，“邑”是实际上具有一定规模，且较为固定的居民集居地。从有关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到商、周时代，即便是作为各级统治中心的都邑，虽颇具规模，而且已有手工业作坊和一定的城区格局规划，但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形态仍有很大差距。如城中的一般居民仍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方式带有浓厚的氏族组织形态和乡村自然色彩，手工业作坊完全属于官方行为等。

从邑、都邑向形态较为完整的城市形态的飞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此期，随着“王天下”局面的崩溃，诸侯之间的彼此纷争、长期混战，社会激烈动荡。各国统治者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纷纷扩大旧城和建筑新城，使得城邑的数量急剧增加。据有的学者考证，

^① 《求古录·礼说·邑考》。

仅春秋时期，现尚有史可考的大小城邑就有600多个，分布于35个诸侯国，实际总数估计在1000个以上。^①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日趋活跃，许多城邑的外在形态和社会内涵都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就经济形态而言，伴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非农业化特征逐步形成，在一些地区进而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经济都会，如齐国的陶、吴国的姑苏等。史称：“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②就社会结构而言，除了贵族和官吏外，又有官私手工业者、商人、艺人、医者、技家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称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一度有居民达10万户，每日“市租千金”。《战国策·齐策》则作了更为生动的描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当然，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只是起步阶段，其所谓的繁荣也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此期的城市不仅空间分布极不平衡，而且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这种情况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则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彼此割据和混战密切相关。连绵不断的战争既造成了社会的长期动荡和市场的区域分割，也使许多新兴的城市毁于一旦。

二是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为早期郡县城市的确立和草市、镇的产生阶段。

秦灭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行郡县制，先后设置了四十多个郡和近千个县，这些郡县行政中心便成为封建城市兴起的主要载体。但秦王朝的统治仅维持了十多年，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战乱，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直到经过汉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后，社会经济

① 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② 《史记·货殖列传》。

才全面恢复,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到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已有5959万余户,^①这是宋以前政府人口统计的最高记录。虽然在两汉之际,这种社会发展势头一度被中断,但进入东汉后又很快得以继续。与此相联系,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不仅形成了由上千个县城、百余个郡城(西汉前期还包括不少封侯国都)和一定数量的经贸都会以及中央都城所构成的多级城市体系,而且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持续增加,经济功能明显增强,社会规划和管理趋于定型。到西汉后期,临淄、长陵、茂陵、阳翟、宛、彭城、成都等一批郡县城市的人口都在10万以上,都城长安和洛阳最盛时则超过了50万。西汉时,长安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闾城溢廓,旁流百廛;红尘四分,烟云相连”。^②邯郸、蓟、临淄、定陶、睢阳、江陵、寿春等城市的工商业十分活跃,呈现出经济都市的某些特征。但从东汉末年起,中国社会再次陷入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大动荡之中。特别是两汉以来城市发展较为迅速的中原地区,各族纷争,战火连绵,城市发展曲折缓慢。不过,也就在这个时期,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地区,由于社会相对稳定,北方民人大批南迁,经济得到迅速开发,城市发展也随之全面起步。据不完全统计,此期全国新增加的县城约有200多个,其中大部分分布在南方地区。如在今浙江一带,东汉末共有郡县城市23个,到南朝后期已增至近60个,其中山阴、钱唐、乌程、章安等一批城市还发展成为东南地区著名的商贸都会和贸易港口。而作为六朝都城的建康,到梁武帝(502—549年在位)统治年间,其城市人口一度达到28万多户、近百万人。南方城市的广泛兴起预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草市和镇也开始出现。草市是随着农村地区市场活动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历史上,“市”作为互通有无的商品交易地,是随着

①《汉书·地理志》。

②《昭明文选》卷1赋甲,班固:《西都赋》。

私有制的产生、产品交换的出现而出现的。《风俗通》云：“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匮也。古者日中为市，致民而聚货，以其所有者，易其所无者。”《易·系辞》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最初的市，主要散布于一些居民的集结点“井”之旁或交通要道上，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云：“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城中之市开始成为市的主体，其规模 and 影响也不断扩大。如《周礼·地官·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进入汉代，城市市场更为发达。如西汉都城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东汉都城洛阳虽只有三市，但在规模上较长安要大得多，每市达“周回八里”之广。^①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部分乡村地带也开始兴起一些常设市。如《后汉书·张禹传》所载：“（张禹）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李贤注引《东观汉记》进一步解释说：“后年邻国贫人来归之者，茅屋草庐千户，屠酤成市。”又如《隶释》卷1《史晨飨孔庙后碑》载：“史君，念孔读颜母井去市辽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立会市。”显然，与以前的市井和临时性农村集市相比，这种农村的新兴市场，商业活动稳定，其市场形式与城中之市相似。由于此类常设市最初是自发兴起的，且散布于城外农村地区，人们便以“草市”之名称之，以别于一般的城中之市。不过，汉代的草市尚只是零星现象，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数量才明显增加，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开始设置官吏进行管理。如东晋政权在建康设有七部尉，其中的南尉即负责管理城外草市。^② 南朝宋时，曾流徙广州的沈怀远在其所著的《南越志》中说：“越之市为墟，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

① 《三辅黄图》卷2《长安九市》；《太平御览》卷191引《洛阳记》。

② 《太平御览》卷90《升州上元县》。

说明在一些地区，草市已为数不少。

与草市不同，镇最初是以纯军事性据点的形式出现的。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镇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两晋时期。如孙吴时，“分会稽立东阳郡，分立丰安县，衢地为属邑，其将郑平戍峥嵘镇”；十六国时期，前秦姚萇曾设置杏城镇。^① 不过，作为一种军事据点，镇的广泛兴起始于南北朝时期。如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在长城沿线设立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等镇，以防御柔然的南攻；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投降北周，“河南九州三十镇一时俱下”；南朝陈时，定州刺史田龙升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②

三是隋唐五代时期，为郡县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形态的初步转型阶段。

此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重新形成和稳定，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城市发展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城市数量进一步增加，到盛唐时，全国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约有1000个左右，其中许多城市的人口有十几万、几十万。特别是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城市，在六朝的基础上又有长足的进步，其发展水平开始接近北方地区。如隋时，地处江淮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号称当时“四大都市”；唐时，广州、泉州、明州都是著名的外贸港口城市，扬州和益州则有“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之说。^③ 城市经济也由此呈现多样化。许多城市除了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之外，诸如邸店、柜坊、飞钱、车坊、质库、寄铺、运输等商业辅助行业和餐饮、娱乐、衣铺等生活服务行业也日趋发达。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到晚唐五代时期，在部分城市，秦汉以来一直实行的将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离的坊市制已出现瓦解的趋向，市场活动不仅向居民区渗透，也向城郊地带扩展。

① 《弘治衢州府志》卷1《沿革》；《太平寰宇记》卷35《关西道·坊州·中部县》。

② 《册府元龟》卷412《将帅部·仁爱》；《陈书》卷B《周灵传》。

③ 韦达：《西京新记》。

如汴州城外的汴河渡口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四方商贾云集，时人王建则以“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①等诗句来描绘其繁荣景象。

草市的发展也出现一些新的动向。虽然封建政府对草市的设置有严格的限制，如唐政府一度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②但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草市的兴起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趋势。特别是在水陆交通沿线和经济发达地区，草市的兴起更为明显。如中唐时期，在东起宋、汴，西至岐、凉，南自荆、襄，北达太原、范阳的中原各地，到处是“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饌丰”的景象，“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③在水乡河泽地区，则是“草市尽迫水际”^④的另一番景象。如德州安德县的灌家口市、荆州白沱的南市、沔州汉川的赤壁市、扬州的白沙市、越州的平水市、彭州九陇县的埡口市等，都是沿江沿河兴起的草市。在一些地区还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草市和主题市场。如唐朝末年西川建德草市中的蚕市，其规模已是相当可观。史称该市“商旅辇货，至者数万，珍纤之玩悉有，受用之具毕陈”，“百货咸集，蚕类莫遗。”^⑤在此基础上，一些较具规模的繁华草市甚至被升为县治，正式发展成为城市。如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升德州安德县灌家口市为归化县；二十三年（735年），徙幽州安次县治于耿桥行市；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升魏州顿邱县观城店为观城县，清丰店为清丰县，贝州临清县张桥店为永济县；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徙兖州鱼台县治于黄台市等。

与此同时，各种大大小小的镇戍更是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特别是到唐朝中后期和五代，随着藩镇割据局面的愈演愈烈，许多镇实际上成为一股股独立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南宋学者谈钥在讲到宋以前镇

① 王建：《汴路即事》，《全唐诗》卷11。

② 《唐会要》卷86，景龙元年十一月敕。

③ 杜佑：《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

④ 杜牧：《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⑤ 陈谿：《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及天王院等记》，《文苑英华》卷808。